



如何让科技创新支撑公共舆论场

□ 刘 柳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增加了“科技支撑社会治理体系”的表述，这表明应充分利用创新社会治理的智能手段。社会治理、科技创新并不是新词，但如何协同并行并获得实效值得思考。特别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社会发展不断面临新挑战。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医学领域的事，其冲击的是社会体系，特别是话语舆论场会影响公众的认知、心态和行为。而科技创新支撑社会治理体系的表述，更加明确和凸显了新时代社会治理智能化以及安防化的重要性。客观而言，舆论场的本质特征在于“多方叙事”。特别是“互联网+”的时代，舆论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与“多方叙事”相互交织，形成了对疫情社会性治理的共振。由此，科技创新支撑社会治理体系，特别是在此次抗疫舆论场的框架下，不断完善和创新相关科技智能手段，让信息资源的真实性、科学性得以真正的高效释放，让误读、谣传消失，让化解不当舆论能力最大化，形成社会治理“智治”体系下可推广的、常态化的经验模式，从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有助于集中力量净化话语舆论场进而推动创新社会治理有机性。疫情面前，“多种叙事”往往呈现出多源头、层次性的特点。多源头是指信息化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这导致舆论信息数量呈几何级增长，进而形成一个信息话语场域。层次性是指舆论场域里的话语信息，其真实性、科学性、有效性这三性呈现的形式不一，难以辨认。由此，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特别是信息化、大数据等手段，集中力量综合各种舆论，并甄别、筛选进而有效利用相关信息，从而净化舆论场，引导群众真实、科学认识疫情，以增强社会治理的系统化和有机性，众志成城一起抗疫。

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由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同时强调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力量

和群众的能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这意味着治理主体多元化，可集中力量共同参与，最大化决策的民主性，以及丰富治理方式的多样化。在这场疫情中，我们是命运共同体，没有谁能置身事外。我们不怕言论，但各种信息聚合的舆论场容易泥沙俱下，并产生信息不实、沟通不畅，进而引起非理性情绪等问题，从而降低治理效率和抗疫效能。将相关技术特别是大数据技术注入疫情的社会治理之中，确实对人数、流动性，甚至追踪到实名者起到了作用。例如，具体到社会组织的最基层单元——社区。有些社区合力打造的党建引领微平台、开展微实事，通过互联网等信息平台来听取民声、汇集民情，将碎片化的社区资源整合，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先锋战斗力。在此次疫情中，社区通过网格化、地毯式的治理思路，运用科技平台，街道党组织的书记、社区主任、网格员、楼栋长通过科技移动终端，实时监测、巡查、上报小区人员情况，大大提升了社区疫情治理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受到居民群众的好评。同时，相关医务人员以及医务用品数据的实时共享，有利于各主体之间的协调互动，打破信息壁垒和沟通障碍，提升治理手段的高效性、技术性与创新性，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情况研判、问题聚焦与决策。这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有助于第一时间精准话语舆论场进而推动创新社会治理高效化。面对疫情的快速蔓延趋势，如何在第一时间发布官方消息、精准话语舆论场进而平息不当、不实消息，从而与武汉第一线进行联系、援助，并对全国其他出现确诊病例的省份进行指导，成为抗疫紧迫而关键的步骤。同时，信息科技也呈现出对群众的认知思维、生活方式甚至是整个社会发展模式的改变与重塑的图景。这对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和高效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是中国社会治理未来发展的必然方向。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指出，现代化历程中，人对自己命运的主宰并对发展中的种种不确定性进行技术控制时，往往忽视了自己本身也是风险来源——即自身也是不确定性因素。此次疫情，从地域性到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蔓延，正是因为第一时间忽视了病毒的严重性，在隔离防护相关措施方面未得到精准认知和控制。由此，科技创新，特别是信息技术支撑下的社会治理，应不断加强预警和风险排查能力，特别是精准话语舆论场，这可有效发挥遏制恐慌却又全面重视疫情的作用。特别是连线、直播等科技的运用，不仅达到公开透明的效果，更为关键的是可实现第一时间对疫情所产生的言论，诸如紫外线杀病毒、空调升温杀毒以及不实言论带来不当认知而进行抢购囤积防护用品物资等社会层面的影响进行高效化治理。第一时间精准话语舆论场，还意味着充分运用科技手段，提高治理前瞻性，变被动为主动，将应对机制由事后不断置前并形成常态化的治理模式。例如，“用数据说话”的新模式结合“红色网格”治理，将当地居民和流动居民形成属地织网，并进行整合和动态分析，保证实时监控，最大化地进行隔离防护。同时，网格平台可实时与居民沟通，对群众的心声、话语形成的舆论场进行准确引导进而为群众提供精准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实施。构建“智治”模式，就要实现信息数据的共享，将物联网、云技术、区块链等技术融入社会治理之中，服务于新时代社会治理。一些地区已经在实践中安装了综合治理调度指挥屏，实时监控并实现中枢调度指挥，使得人员、社区、街道、城区甚至整个城市的安全问题得到无缝隙覆盖。这为此次抗疫战斗，提供了实实在在的高效治理技术支持。

有助于打造负责任的话语舆论场进而形成社会治理的“中国之治”。疫情之下，从地域性的武汉到举国上下乃至全

球，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我们同呼吸共命运。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快速及时地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情况。同时，我们形成的快速化、科学化、高效化的社会治理在此次疫情战斗中，呈现出比SARS时期更加专业化、智能化、系统化的治理之象，这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不仅得到其他国家的好评，并可为全球的社会治理提供经验和借鉴，打造社会治理的“中国之治”。

何为负责任的话语舆论场？除了上述提及的集中力量在第一时间给出真实、科学、准确的疫情信息之外，能够心怀世界、以人为本并提供相关援助，这是大国、强国敢于发声和敢于担当的风范。同时，我们可看到治理概念的提出，其实源自于西方。而中国的治理理论以及相关模式的发展，必然带有中国特色等本土化的烙印。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模式实行上下联动，同时，注重科技创新支撑社会治理。特别是抗疫战斗，将科技创新注入社会治理，其优势就在于打破了静态的国内范围的疫情研究的社会治理模式，更注重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国际医疗专业组织机构展开联合研究，这恰恰是负责任大国形成“中国之治”的亮点之一。

综合而言，运用科技创新手段支撑社会治理，集中力量并在第一时间净化而精准话语舆论场，达到医护救助的高效与秩序的稳定开展，大力推进疫情战斗的实效，这些确实有目共睹。值得一提的是，用“小程序”上线能快速灵活解决疫情中辟谣、查找定点医院、预订医疗用品等“大事情”，进而实现更有温度的服务、更有效的治理、更为共享的实时数据，此为根本。



四下其手推动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发展

□ 刘东杰

农村社区社会组织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参与力量。基于此，2018年民政部出台的《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中规划，“力争到2020年，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初见成效，实现城市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10个社区社会组织，农村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5个社区社会组织。”但由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在农村社区还普遍存在着各类资源薄弱、村民观念保守、村两委专权、权威认可单一等一系列问题，致使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困难重重。有必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发力，破除现存障碍，推动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发展。

落实基层自治，扩展组织发展自由空间。当前，由于传统管制思维的影响，基层政府对于放松农村治理仍然心存疑虑，生怕一放就乱，背负责任。基层政府通常通过公共权力的直接管理，或间接指导村两委代行落实的方式，将基层政府权力的影响力深深植根于农村各类事务之中，这也带来了村民对于政府部门的单向度依赖。最终形成了一种政府对农村直接介入加深，村民对政府依赖加重，依赖加重反过来又要求政府更进一步介入的恶性循环。这就大大压缩了社会组织自由活动的社会空间，使社会组织在寻求服务对象上出现困难，最终抑制了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

要解决这一困局，需要基层政府来一次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摒弃传统的管制思维，将基层自治真正落到实处，把服务和促进农村社会公共领域发育作为首要职责。这需要基层乡镇政府严格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将“指导”而不是“领导”，“建议”而不是“管理”作为处理政府与农村社区关系的主线。切实降低基层政府运用公共权力对农村介入的广度和深度，为乡村社会在框架内自主发展松绑，让农村社会公共领域在自治自

为中发育起来。农村社会公共领域一旦发育起来，相应的也就会为内生或者嵌入各类服务于农村社区的社会组织提供了具体的活动场域。

做大农村基本盘，夯实组织资源汲取基础。社会组织虽然是非营利性组织，但其生存发展仍然需要汲取一定的经济资源、人力资源、社会关系资源等。长远来看，这些资源的汲取可能更多地需要基于农村社区，而不是城市或者国家的政策性投入。但由于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着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口流出较大、社会关系走向功利化的问题，这就致使社会组织在农村汲取资源相对困难。缺少或没有资源汲取，再加上来自城市的支持疲软，致使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缺少有力的资源支撑，很难正常开展服务，更遑论做大做强。

要增强社会组织汲取资源的经济社会基础，需要增强农村吸引力，做大农村发展基本盘。首要的就是需要保证乡村经济得到发展，推动乡村居民生活走向富裕。否则，未来农村人口仍然会不断外流，最终走向空心化，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服务对象也会持续减少，汲取资源的经济社会基础只能是走向萎缩。其次是要健全农村社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将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健全起来，无论医疗、教育、养老等都应当有一个基本保障，这样才能增强乡村的吸引力和吸附力，留住本地人，吸引外地人，做大农村基本盘。另外，还需要持续改善农村生态环境。遏制农村垃圾围村、水体恶臭、尘土飞扬、缺水少绿等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现状。通过政策性投入、企业帮扶、村民自治、社会组织参与等多种途径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让村民稳得住、不外流，让游客进得来、呆得住。

消除抵触排斥，增强组织合作共生

性。村两委作为服务农村社区一线的准官方“权威机构”，与村民公私活动都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服务村民与管理农村事务，是其当仁不让的职责，也是其获取较高威信的基础。由于担心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会削弱自己在村民心目中的权威地位，少部分村两委通常对社区社会组织活动和发展存在疑虑，甚至于出现抵触和排斥的现象。如，禁止社区为社会组织活动提供办公场所等。村两委的排斥和抵触，使原本生存困难的社区社会组织在农村中的发展更是雪上加霜，这严重抑制了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

要解决这一点，还需要地方党委政府在落实《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时，对村两委与社会组织两种治理机制与功能进行必要的澄清。村两委是领导和落实村民自治的基层政治社会单位，其主要目的是加强党对基层工作的领导权和推进基层民主实践，其权威主要来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村民的认同和支持；而社会组织作为服务特定对象的非营利性单位，通常目标单一，活动内容与范围有限，它的权威主要来自于服务对象的支持和认同。因此，两种治理机制和治理权威并不是一种替代关系，而应是在消除抵触排斥，达成相互理解基础上的合作共生关系。

宣传服务并举，提升组织社会认同度。在农村，由于传统宗族势力瓦解、政治经济精英流失、社会公共领域发育程度相对较低等原因，通常并不存在一个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社会权威。所以，党委政府往往就成为村民认可度较高的单一权威。在公私事务的处理上，他们更愿意信任来自党委政府的力量，而非来自社会的力量。同时，由于村民对社会组织缺乏基本的了解，再加上农村社会组织通常规模较小，活动能力偏弱，

因此，除了农村社区内由熟人自发组成的互助性社会组织外，通常来自村外的各类社会组织都会面临着如何获取村民认同和接受的难题。缺少村民的基本认同，社会组织在农村社区中的活动就缺少了最基本的社会合法性，致使活动举步维艰，难以发展壮大。

如何赢得村民的认同和支持？一方面需要加大社会组织的宣传力度。由于当前在大部分农村地区留守的居民仍然普遍存在着视野偏狭、知识素养不高、商业意识渐趋浓厚的现实问题，所以，对社会组织不解、误解、曲解的现象还很常见，这不利于社会组织产生影响，更谈不上去做大做强。因此，当务之急是开展宣传工作，尽可能地利用权威媒体向村民宣传介绍社会组织的性质、功能、目的，以及在农村社区发展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必要性，让村民对于社会组织能有一个更为客观的认识。另一方面是提升社会组织的服务效度。社会组织最终要获取村民的认可，还是需要做出扎扎实实的服务业绩来，让村民切实享受到社会组织提供的便利化的优质服务。这需要基层政府与村两委助力社会组织做好服务工作的首次“航行”。

总之，虽然在农村社区培育社会组织、保证社会组织顺利开展工作，以及进一步发展壮大仍然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但只要紧跟党和国家的改革步骤，勇于自我革命、奋力谋划创新，一个服务于乡村社会治理的社会组织网络一定会如期而来。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在市域范围的具体实施，是国家治理的中间层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旨在突出其承上启下、以城带乡的辐射作用。全会还把坚持发展“枫桥经验”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这两项工作均成为当前中央高度重视的工作，且两者紧密相关、息息相关。

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市域社会治理高度契合。新时代“枫桥经验”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重要范畴，适用于社会治理的各个层级。因此，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是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范畴属性看，二者具有一致性。新时代“枫桥经验”被界定为“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方案”，属于社会治理的范畴，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套社会治理方案没有层级的限定，也适用于市域。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在市域层面的具体实施，重点针对社会治理领域，而非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所以两者属性基本一致，都属于社会治理范畴。

从功能价值看，二者具有相似性。“枫桥经验”的核心功能是就地预防化解矛盾，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社会治理的最重要功能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包含十三个制度体系，其中第八个制度体系是社会治理体系，即“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可见，社会治理的功能与“枫桥经验”基本相同，都是防范化解矛盾风险。而且作为市域层面的社会治理，拥有解决社会治理中较大矛盾问题的资源和能力，能更有效地把矛盾风险化解在萌芽、控制在市域，避免矛盾向更高层级上交。

从方式方法看，二者具有同一性。无论是新“枫桥经验”，还是市域社会治理，采用的方法主要是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或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四化同步”。这些方式方法是传统社会治理向现代社会治理转变的重要途径，因此也构成了新时代“枫桥经验”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法论。

坚持借鉴“枫桥经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可充分发挥新时代“枫桥经验”五大特色，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尽早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市域特征、时代特点的市域社会治理新模式。

坚持“党建引领”，加大市域社会治理的统筹协调。从实践针对性来看，目前地级市的统筹能力相对较弱，相较于拥有完整立法权、系统规划能力和强大人财物统筹能力的国家治理、省域治理，以及相较于一直保持良好联动传统、相对紧密推动的县域治理、镇域治理，市域层级处于较为尴尬的层级，其“中间层级”有时甚至变成“悬浮层级”。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市域治理，其政策意图就是要发挥党委统揽全局、协调作用的作用，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统筹功能、资源和力量，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一市一地的现代化助推省域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坚持“人民主体”，突出市域社会治理的共建共享。“枫桥经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经验，把“枫桥经验”与市域社会治理相结合，可以使市域社会治理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目前“枫桥经验”已经从乡村社会治理延伸到市域社会治理，其中包含了城市治理。城市治理比乡村治理更能集聚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等多元化治理主体，更有利于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借鉴『枫桥经验』

□ 卢芳霞 刘开君

人人享有的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

坚持“三治融合”，强调市域社会治理的综合施策。“三治融合”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倡导的基本方法。在治理情境更为复杂的市域层面，恰恰需要多样化的治理方法，以达到综合施策的效果。为了让“三治融合”更富操作性、更好贯彻落实，要充分利用好地级市新获得的立法权，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明确“三治”的各自范围、边界、清单，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和部门在推动“三治融合”中的各自职责，不断完善市域社会善治新体系。

坚持“预测预防”，加强市域社会治理的源头治理。“枫桥经验”提倡“立足于早，立足于小，立足于激化前”解决矛盾。市域层级有着相对较强的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能力，有着相对完整的信息功能平台，有着相对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能够把好源头关、监测关、管控关，能最大限度把各类矛盾和风险防范在基层，控制在市域。

坚持“基层基础”，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的重心下沉。市域社会治理的重心依然在基层。要突出基层基础导向，从基层最小单元、最小细胞抓起，推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资源下倾。要充分发挥市域层面的统筹协调作用，真正实现市、县、镇三级联动和事前、事中、事后三环相扣，不断夯实市域社会治理的基层基础。要把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理念在市域治理情境中拓展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信访不出县，上访不出市”，牢牢守住市域安全稳定底线，有效防止矛盾风险向上传导、向外溢出。

